

关于重庆“棒棒军”符号的表意机制与动态演变的研究

陶琳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本文基于符号学理论, 结合田野调查与媒介文本分析, 系统探讨“棒棒军”符号的表意机制与动态演变。研究发现: “棒棒军”符号借助竹棒、身体姿态等物质能指, 构建了涵盖“底层劳动者”“城市精神”与“时代记忆”的多元所指系统。在城市化与产业升级的动态进程中, “棒棒军”符号经历了职业群体的消逝、社会认知的转向以及与发展互动的结构性变迁。本研究突破了原有的静态分析视角, 揭示了劳动符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流变规律, 为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文化的符号再生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符号学; 棒棒军; 动态演变; 能指所指

1 研究背景

重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其独特的山城地貌与码头经济催生了对人力搬运的需求, 促成了‘棒棒军’职业群体的诞生。“棒棒军”手持竹棒、背篓等工具, 穿梭于陡峭街巷, 从事货物搬运, 其劳动场景成为重庆独特的文化符号。这种劳动方式是改革开放后城乡人口流动与重庆山城空间实践的具象化体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棒棒军”的劳动场景逐渐从码头延伸至城市的各个角落, 其符号意义也随之丰富和拓展。目前, 学界对“棒棒军”及其文化现象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历史学视角来看, 重庆特殊的地形结构催生了“棒棒军”这一非正规职业形态。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共同促成了“棒棒军”职业符号的生成(马春丽, 2010), 该群体始终保持着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双重联结(麻国庆, 2015); 从人类学视角来看, “棒棒军”的身体符号具有深刻的文化编码。其身体标记既是劳动实践的产物, 也是身份认同的物化表征。闫新新(2015)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 劳动者通过“身体资本”的仪式化展演, 在城市空间建构起独特的“可见性”;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 “棒棒军”的社会支持网络与符号互动紧密关联。冉琼(2021)通过对奉节县四个社区的深入访谈发现, 由政府、媒体和社区构成的“支持符号体系”对该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产生了直接影响。肖云与刘慧(2008)的量化研究则基于对重庆市363名“棒棒”劳动者的调查分析, 揭示出

社会保障的缺失致使“棒棒”这一符号被异化为“底层”的代名词, 进一步凸显了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困境;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 媒介叙事在“棒棒”符号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对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进行解读, 发现其通过“身体特写—空间位移”的符号链, 重构了劳动价值的现代性叙事(许爱珠、李杰, 2018); 从符号学视角来看, “棒棒军”符号的表意机制具有丰富的内涵。马宇(2009)对“棒棒儿”称呼语的语义分析揭示了其作为城市文化符号的隐喻功能。

综上所述, 重庆“棒棒军”群体既是地域文化的产物, 也是社会关系的交织体。然而, 现有研究多为静态描述, 忽视了符号随城市转型的意义流变。鉴于此, 亟待结合既有研究成果与当下社会语境, 动态剖析“棒棒军”符号表意系统的生成逻辑和演变过程, 为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符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 “棒棒军”符号的表意机制

关于“符号”一词, 中西符号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清晰的定义。国内学者赵毅衡(2013)认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 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棒棒军”作为重庆独特的文化符号,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社会意义。

2.1 物质载体与能指呈现

“棒棒军”群体的直观物质载体为一根结构简单却功能实用的竹棒, 重庆方言中称之为“棒棒”。尽管其外观平

凡,但这根竹棒却成为“棒棒军”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显著标识,构成了“棒棒军”符号能指的核心物质元素。除竹棒外,“棒棒军”的着装亦构成其符号能指的重要部分。“棒棒军”多穿朴素耐脏的衣物和解放鞋或廉价胶鞋,与周围人群形成对比,强化了其独特符号形象。“棒棒军”的劳动场景亦是其符号能指的关键呈现维度。在重庆的码头、车站、批发市场等人流物流密集区域,常见其成员肩扛重物、步履匆匆。他们弯腰驼背,借助竹棒将货物稳稳挑于肩头,在狭窄街巷与陡峭台阶间艰难行进。这种兼具力量感与艰辛感的劳动姿态,构成了“棒棒军”符号在动态层面的能指表达,使观者在目睹此类场景时,能够迅速与“棒棒军”这一概念建立直接关联。

2.2所指意义的多元构建

“棒棒军”是重庆地区特指的来自周边农村、以竹棒为搬运工具的体力劳动者群体。因重庆地形复杂、车辆通行不便,他们成为了城市货物搬运的核心力量,负责码头卸货、货物搬运至市场摊位以及帮助居民搬运生活用品等工作。在重庆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棒棒军”象征着坚韧不拔与勤劳朴实的精神,尽管面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艰苦的工作环境以及微薄的收入,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展现出极高的职业精神。其不畏艰难、默默付出的精神业已成为重庆城市精神的缩影,集中体现了重庆人民在困境中不屈不挠、拼搏奋斗的“雄起”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重庆人努力前行。

“棒棒军”不仅承载着特定时代记忆,其出现与发展还与重庆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时期,“棒棒军”为城市物资流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见证了重庆从相对落后的内陆城市向现代化大都市的转变,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兴衰变迁。因此,“棒棒军”符号成为连接重庆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唤起人们对城市发展历程的回忆及对艰苦创业岁月的怀念。

3 “棒棒军”符号的动态演变

符号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与演变(皮尔斯,201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与劳动市场的深刻变革,“棒棒军”群体数量逐渐减少,其符号意义也从典型的职业标识转变为对过往时代的集体记忆与象征符号。作为重庆独特的民俗文化符号,“棒棒

军”不仅是城市变迁的历史见证与缩影,还在职业群体演变、社会认知转变与城市发展互动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动态性特征。

3.1职业群体的消逝

“棒棒军”符号的初始意义根植于其职业属性。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重庆“棒棒军”群体规模达到顶峰,从业者超40万人,成为城市物流体系的关键劳动力。然而,随着城市交通改善、装卸运输机械化发展以及物流行业崛起,传统人力搬运需求锐减,“棒棒军”职业功能逐渐被机械化运输替代。近年来,重庆主城“棒棒军”数量锐减,业务萎缩,群体老龄化严重。

本文通过对重庆市万州区五桥南站和变维大厦周边20名“棒棒军”的访谈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替代性的增强与新一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多元化是导致该行业变化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促使交通与运输方式不断优化,物流、快递、闪送等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使得货物运输更加机械化,大幅减少了对人力搬运的需求,例如十七码头和万州港的货物运输已高度机械化。与此同时,新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如进入工厂、从事外卖配送或货运司机等,而非继续从事劳动强度大且收入较低的“棒棒”职业。此外,20%的受访者指出年龄结构老化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是该群体规模缩小的重要原因。访谈对象中,50岁以上从业者占比达80%,年轻一代加入意愿极低,致使该群体呈现老龄化趋势。随着农村低保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部分从业者选择返回农村,依靠社会保障维持生活。另有20%的访谈对象认为,该行业劳动强度大且收入低,是促使许多人离开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加速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该群体因无法适应高度发展的城市环境,逐渐被边缘化并退出历史舞台。

3.2社会认知的转向

在“棒棒军”发展初期,社会大众对其认知多聚焦于其体力劳动的职业属性,片面地将其归类为城市底层劳动群体,并贴上“廉价劳动力”“文化程度低”等标签,导致其在社会地位排序中居于边缘位置。这一时期,“棒棒军”符号所负载的社会评价相对较低,仅作为城市经济体

系中底层劳动阶层的符号标识，缺乏在社会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及正面形象塑造能力。

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与劳动者权益意识的提升，社会对“棒棒军”的认知逐渐转变。媒体与文学艺术作品的深入刻画，揭示了其背后蕴含的勤劳、乐观与顽强等优秀品质，推动了社会认知的更新。“棒棒军”符号由此从底层职业标识，拓展为具丰富精神内涵的文化象征，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尊重与认可，其符号内涵得以丰富与升华。

“棒棒军”作为重庆城市发展特定阶段的历史见证者，虽未被新一代重庆人亲身经历，但借由长辈讲述与文化作品传播，形成了带有怀旧色彩的社会认知。在此基础上，“棒棒军”符号被赋予了城市记忆与乡愁寄托的情感内涵，成为连接重庆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促使人们对城市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思考，其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意义愈发深厚且多元。

3.3 与城市发展的互动

在重庆城市发展早期，“棒棒军”与城市建设紧密相连，为城市物资流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关键人力支持。“棒棒军”这一社会文化符号与城市快速建设的蓬勃态势相互映衬，成为城市初始发展阶段对多元劳动力巨大需求及原始发展动力的具象化表征，从微观层面直观反映出城市活力与积极向上发展态势。

在城市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随着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升级，“棒棒军”传统职业模式与城市新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城市空间规划更加注重功能分区与交通便利性，传统以人力搬运为主的物流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城市空间布局。然而，在城市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当下，城市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本土特色文化的重要价值。在城市文化品牌塑造中，“棒棒军”作为重庆独特民俗文化符号，通过多元方式挖掘与展示，如在重庆民俗文化街区，通过实物、场景复原等手段呈现其历史文化，融入城市文化体系。在此过程中，“棒棒军”符号从城市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象征，转变为城市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实现了符号意义在城市发展新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此外，在重庆城市智能化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棒棒军”群体可能逐渐淡出传统

劳动市场，但其符号在城市文化领域仍将延续并拓展其价值。借助数字文化产业与虚拟旅游等新兴领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劳动场景以及将其形象融入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棒棒军”符号实现了意义的创新表达与价值提升，为重庆城市文化的全球传播赋予独特魅力。

4 结语

“棒棒军”符号体现了物质工具、身体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从码头挑夫职业形象升华为重庆城市精神象征。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棒棒军”符号从码头苦力到城市精神象征的动态演变，是中国城镇化中劳动群体身份转型的缩影，也是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生动实践。该研究为非遗保护与城市记忆传承提供启示，未来可关注数字技术对劳动符号的再编码，探索传统文化符号的创新表达路径。

参考文献：

- [1] 马春丽, 肖世忱. (2010). 重庆市“棒棒”群体产生的原因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 38(30), 17357-17358.
- [2] 麻国庆. (2015). “乡土范畴”与“破土而出”——《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乡土性》序[J]. 思想战线, 41(05), 58-61.
- [3] 闫新新. (2015). 肩膀上的日子——一项关于山城棒棒的人类学研究[D]. 南京大学.
- [4] 冉琼. (2021). 山城“棒棒军”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基于奉节县四个社区的深入访谈[J].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3(01), 27-32.
- [5] 肖云, 刘慧. (2008). 低层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需求与对策研究——基于重庆市363名“棒棒”的调查分析[J]. 南方人口, (02), 44-49.
- [6] 许爱珠, 李杰. (2018). 《最后的棒棒》：平凡中的伟大[J]. 当代电视, (12), 78-79.
- [7] 赵毅衡. (2013). 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J]. 国际新闻界, 35(06), 6-14.
- [8] 皮尔斯, 查尔斯·桑德斯. (2014). 皮尔斯：论符号[M]. 赵星植, 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9] 马宇, 慕宇. (2009). 称呼语“棒棒儿”与城市文化[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0), 172-173.